

海外诗家向艾青致敬

杨四平文/图

每位诗人都自己创作和生命中的高光时刻。有“人民诗人”美誉的艾青，曾奇迹般地出现过两次创作高潮（抗战与新时期）。在国内，艾青的名字家喻户晓。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艾青也曾让海外读者充满崇敬。如果了解艾青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就会明白艾青作为世界级诗人的声誉真可谓实至名归。虽然当今的世界文学格局和语境已与艾青所处的年代大为不同，但梳理其中的历史经验，依然可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宝贵镜鉴。

“诗人们：向艾青致敬！”

新中国成立前，艾青的诗就开始陆续被译介到海外。较具规模和影响的无疑要算1947年由英裔意大利中国学家罗伯特·白英在伦敦出版的《当代中国诗选》，收入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8首抗战诗名篇；此外还有日本学者岛田政雄撰写的论文《艾青的诗》。新中国成立后，凭借新中国的外交东风和文化交流的热烈展开，艾青以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威望，频繁出席各类重大外事活动。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无数次往来和海外游历中，艾青的诗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980年6月16日至19日在巴黎召开的中国抗战文学国际研讨会，可视为艾青诗歌海外传播的一个高光时刻。7个会议主题中，有一个就是“诗人们：向艾青致敬！”，并在会议最后一天压轴，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此后不久，在海外就形成了“艾青热”，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1989年莫斯科虹出版社出版的《艾青诗选》和1993年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俄罗斯中国学家切尔卡斯基撰写的著作《艾青：太阳的使者》是彼时“艾青热”的一个缩影。

艾青之所以能成为享誉世界的大诗人，是因为以下诸多方面的原因——

人民的诗歌，世界的诗歌

宽广而深厚的人民性，是艾青诗歌的根基和灵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追求自由与真理的斗争中，艾青的诗为海内外底层人民“代言”，与民心相通，和国运相连，发挥了纽带作用。早在抗战期间，艾青的诗就被译介到苏联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质言之，艾青的抗战诗不只有某些外国学者所说的“中国性”，而且蕴含着包括“中国性”在内的“世界性”“人类性”“人民性”。

某些中国学家对艾青诗歌的人民性存在隔膜，将艾青的某些抗战诗定性为“政治诗”，认为艾青抗战诗里的民族感情宣泄冲淡了美学意蕴。倘若以这种观点来看待艾青某个时期的诗歌写作，倒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出版的外文杂志《中国文学》和香港出版的《译丛》发表了很多翻译成英文或法文的艾青诗歌，由《中国文学》衍生而来的外文版“熊猫丛书”之《艾青诗100首》，在海外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但



1982年由《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的英文版艾青长诗《黑鳗》，因其将人民性窄化为政治性，其海外影响甚微。

可以发现，艾青在海外影响最大的诗，是那些包括中国性在内的人民性的、国际性的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中国学家顾彬在其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盛赞道，艾青“是世界主义者，能够向他者敞开”；与此同时，顾彬指出人们“最终只能从国际性的诗歌演化角度来理解他”。显然，这不只是针对艾青国际题材的诗而言的。艾青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但他又不是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者，而是胸怀天下、兼济苍生。艾青是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切尔卡斯基曾反复考量，“在20世纪世界诗坛上应把中国诗人——艾青放在与谁并列的位置？”他的最终结论是，应该把艾青与希克梅特和聂鲁达并列。由此我们认识到艾青在世界文学经典序列中的显赫地位。质言之，只有那些具有良知、正义、无畏、果勇、善良和希望的人民的诗，才具有真正的国际性和世界性，才有可能被海外广泛译介和接受，并产生世界影响。

精妙“抓心”，可译性较强

艾青的诗具有精妙“抓心”的艺术性。艾青青睐口语化，力创口语美，以简洁、朴素、集中和明快为“诗宗”。艾青的诗以蕴涵着诗人全部真情实感和时代精神的“土地”和“太阳”作为核心意象，虽然抒写了苦难，但并不使人沉沦，反而因为有了希望的照耀，苦难也能开出光明的花朵。由之而来的眼里饱含热泪的“艾青式的忧郁”，是艾青给中国新诗的崇高美开创的新生面。

艾青的诗具有可译性、易译性。非韵文学翻译难，诗歌翻译难上加难，难到“诗不可译”之说。但是，很多海外中国新诗译者表示，艾青的诗比较容易译。比如法文版《艾青诗选》的译者凯瑟琳·韦佳德就作如是观。除了刚才提到的艾青的诗美原则和

“诗化口语”外，有人注意到，艾青的诗喜欢用“的”字。这有可能受到法语“de”的影响，更是受到了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影响，甚至还有浙江方言的影响。总之，艾青诗的易译性是其走向世界的又一重要原因。他的诗被译成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那些艾青诗歌海外译者如凯瑟琳·韦佳德、切尔卡斯基、罗伯特·白英等对艾青诗歌海外传播及其经典化功不可没。他们都是缘于对艾青诗歌的喜爱，主动“拿去”，积极翻译，扩大了艾青诗歌在海外的影响。

易于成诵，助推海外热播

艾青的诗具有可诵性。这一点与其易译性密切相关。“诗朗诵”是中国新诗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又一重要环节。海外读者喜欢通过这种方式接受中国新诗。据现有资料可知，艾青诗歌最早在海外传播不是诗歌文本的翻译，而是诗歌的朗诵。

日本中国学家秋吉久纪夫在《林林采访记——解析30年代中日文学运动》中记述，1936年1月12日下午，在神保町举办的一次“聚餐会”上，“骆驼宝哭着朗诵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1957年艾青访问智利时，聂鲁达陪同他到智利大学出席报告会，智利大学的大学生现场朗诵了很多艾青的诗，场面热烈，氛围融洽，效果甚佳。

除了由中国留学生在海外朗诵或由国外学生朗诵艾青的诗外，一些国外专业演员也朗诵过艾青的诗。1979年，当艾青走访奥地利作家协会时，奥地利演员当场朗诵了法文版《艾青诗选》里的几首诗。有时，艾青在海外还亲自朗诵自己的诗，比如1979年在与德中友协积极分子会面时，艾青即兴朗诵了《墙》。据说会议快要结束时，一位中年妇女站起来，声音哽咽，希望艾青把该诗译文留下，由此可见艾青诗歌的艺术魅力和艾青自身的人格魅力，而后者也有利于艾青诗歌“走出去”“走进来”“走下去”。

艾青每次出访，都有海外媒体进行跟踪报道。在这些报道中，我们常常看到如当年《奥地利新闻报》报道中出现的“和蔼可亲”“令人愉快”“眼神诙谐”“智慧诗王”等字眼。这里有必要提及1980年8月底到12月底，艾青应邀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经历。其间他到美国各地交流、演讲和参观，与美国读者结下了深厚情谊。这再次表明，一位诗人文本外的亲和力，会大大有助于其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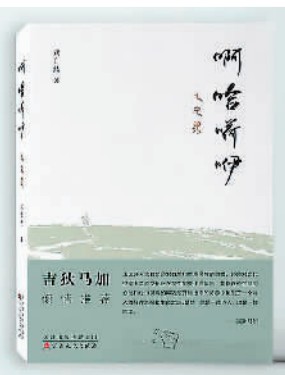
此外，海外中国学家对艾青的专题研究，为艾青撰写“评传”，在“文学史”中为艾青设列专章，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艾青作品等，都为艾青在海外经典化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概言之，艾青诗歌的人民性、艺术性、易译性和可诵性以及文本之外艾青的人格力量，是艾青走向世界并产生世界影响的主要原因。虽然艾青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了，但艾青的诗、艾青的精神仍在。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

首《啊哈嗨哟》：“从远古涌来/就生生不息/唱过四季/唱下泪滴/唱碎风雨/唱得鲜花遍地/啊哈嗨哟/飘过天际/飘向心底/飘入梦境/飘得心旷神怡/啊哈嗨哟……”就一首典型的谣曲，意象鲜明，句式简短，节奏明快，读起来朗朗上口，谱上曲子很容易传唱开来。诗集中类似的谣曲风诗篇占了很大比重，这是武自然潜向蒙古族民歌学习，特别是借鉴了“短调”的结果。

谣曲的特点是便于传情，便于传唱，它更近似于歌词或者本身就是歌词，而不一定能让读者“仰而思，俯而读”。而诗歌，特别是现代诗，其内涵更多一些思想与理智的成分。正是由于意识到谣曲与现代诗的审美差异，诗人武自然的诗并不像传统歌词那样，纯在悦耳的语言形式上制造效果，而是运用超越时空的想象，以及象征、隐喻、通感等手法，指向心灵与存在，创造出富有历史感的精神空间，在《四根弦四条路》《推倒一面墙打开一扇窗》《骑马少年》《马儿你为何忧伤》等诗中都能看到这种明确的追求。

《啊哈嗨哟》为当代诗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带着花香和奶香的风，让读者沉浸在那悠扬、忧伤、洒脱的心境中。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创作谈



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约，谈一下《我和我的命》的创作初衷。

作家的职业可以从多方面诠释，但有一点肯定是不容置疑的，即——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给更多的人也就是读者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写过一篇长文《扫描中国女性》，文中对某些困难家庭中的长女表达了敬意，认为她们是那些家庭中的“责任天使”。

后来我收到一个女孩的来信，说她的“小五姨”就是那样的“天使”。信中有段文字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小五姨”是姐妹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高中毕业）；是家族中最早离开山里农村到深圳打工的人；于是呢，“小五姨”在深圳所租的那间小屋，仿佛成了家乡设在深圳的“办事处”。到了可以打工的年龄，外甥、外甥女们以及同村甚至外村的小青年，纷纷投奔到“办事处”来，多时连地上都横七竖八睡着人。“小五姨”早上像跳芭蕾舞似的在身体之间回旋，寻找鞋子。她从无怨言，尽量为每一个投奔到自己名下的小青年排忧解难。可“小五姨”只不过辈分大，年龄并不大，才25岁……

那封信使我很感动，我附上自己的感言，把它转给了一家杂志发表了；似乎当年的《读者》也转载了。

原来“责任天使”未必是一个家庭的长姐！

那个我从没见过的“小五姨”，从此存活在我的脑海里了。有时会忘记她，有时会联想到她，彻底忘记已成不可能之事。每一次联想到她，从她的样貌、性格到她的心灵和人生观，一次比一次更加清晰。再联想到时，仿佛她在对我说：“还不把我写出来吗？”

我越来越觉得，她是值得我“写出来”的。

她的“出生”非常顺利。因为动笔时，头脑中的她已经呼之欲出了。中国之大多数“80后”是独生子女，“90后”“00后”及以后若干代可能也是如此。出生政策虽已放开“二胎”，但多数家长恐怕宁愿选择做独生子女的父母。

独生子女由于是一个家庭的“独苗”，也必然是父母、祖父母、外祖母心目中的“宝贝疙瘩”，使他（她）们想不自我为中心，都不知怎么才算不“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几乎成了他们自然而然的“本我意识”。

故而，以我这一代人的眼光来看“80后”，不免“毛病”多多。

如今，年龄最小的“80后”30多岁了，年龄最大的40多岁了，而我从她（她）们身上所看到的，已不再是“毛病”，而是可敬的方面了。

邵丽长篇新作《金枝》聚焦代际之殇

本报记者 张鹏禹

近日，作家邵丽关注两代人命运与成长的长篇新作《金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小说讲述了一个父亲在追求进步中建立了两个家庭，而他与子女们在几十年间却陷入各自的人生和人性困境中。半个多世纪以后，父亲从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悄然落幕，但是他留下的两个家庭以及在这场困局中缠斗不休的妻子和儿女们，却无法走出漫长的阴影。小说既表现了对父亲的审视这个代际书写的恒常话题，同时也通过对自我的审视，反思“我们如何做父母”这个重要的生活命题。

石一宁评论集《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出版

本报电（文一）石一宁评论集《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集，收入了作者近年发表的数十篇相关文章。

作者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评论，同时是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主编，《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一书展现了作者对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深入理解和深度思考，既有对中

写下那些我佩服的青年

梁晓声

首先有一点使我十分佩服，那就是——我们成长于物质普遍匮乏的年代，而他们的成长背景物质诱惑多多，有时形成诱惑的泡沫堆，从四面八方包围，撕扯成长期的少年和初入社会的青年，大有淹没之势。第二点是，我们就业后经历了较长的“收入普调”和“住房分配”时期，这使全中国同龄的脑力劳动者，在收入方面的差别并不大，今天看来，那种差别几可忽略无视。而我们的下一代，在尚未就业之前，就已受到收入差别天上地下的现实的巨大压力。

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80后”，总体上非但没有自暴自弃，没成为“垮掉的一代”，没成为社会的“零余者”，反而越来越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不消说，他们大多是平凡的，但“拒绝平庸”显然是他们的“代精神”。努力点儿、再努力点儿，优秀点儿、再优秀点儿，也成了他们不言自明的共识。

我常常扪心自问，如果我这一代人集体回到少年和青年时期，经历他们所终日面对的诱惑和财富分配差异的巨大刺激，我们果真能表现得比他们更好吗？

以我自己而言，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也常起一种大的冲动，想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探究他们的真情实感，叩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我一向是采访者，没有机会采访年轻人。即使有那样的机会，也未必能获得如实的回答。

于是我又联想到了“小五姨”——她是文学作品中的“那一个”，就经历而言，与后来的年轻人有一致性，也有独属于她自己的特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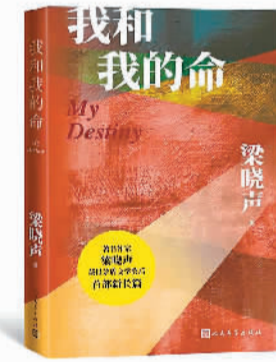
然而就那种不甘自暴自弃、不甘“垮掉”、不甘成为“零余者”的内在精神来说，我认为我笔下的主人公们，与当下大多数青年或许会是“知音”。而在这一点上，我笔下人物的性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笔下的方婉之和李娟们，会成为当下青年们的朋友吗？

毫无疑问，“她们”已成为我的“忘年交”，我因有这样的朋友而愉快。

我活到今天，由文学作品而结识的朋友也已不少，有些是别的作家介绍给我的，有些是我自己“塑造”出来的。我“塑造”了他（她）们，并不意味着我比他（她）们高出一等；恰恰相反，他（她）们往往也对我为人处世的态度产生了深刻而良好的影响，成为我精神上的良师益友。

至于方婉之们，她们肯定也会有她们的“社会关系之和”。“她”在人间境遇怎样，我也只能深情关注……

(作者系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作评介

内蒙古民歌哺育出的清新之作

——评武自然诗集《啊哈嗨哟》

吴思敬

读武自然的新诗集《啊哈嗨哟》，仿佛能听到有一股天籁之音从远古飘来，优美的旋律，浑厚的音色，把我带到内蒙古的辽阔草原。

武自然是出生在内蒙古的汉族人，深受蒙古族文化的熏陶，对内蒙古的山川、土地、大草原有刻骨铭心的爱，对蒙古族兄弟深厚的感情，使他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用诗歌表达对大草原的热爱，对蒙古族文化的倾心。他在这部诗集中把知识形态的蒙古族文化转化为诗，在诗集中注入了大量蒙古族文化元素。武自然不仅捕捉到最能彰显蒙古族文化特点的意象，诸如长调、酒歌、呼麦、短调、四胡、马头琴、毡房、敖包、勒勒车、那达慕……而且还附上了他通过精心考察与研究作出的注解，与诗歌正文构成“互文”，把文化与诗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长调》一诗，作者在注解中写到：“长调：蒙古语发音为‘乌拉叮咚’，意为长歌，是蒙古族传统音乐，被誉为‘草原音乐活化石’。具有鲜明的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特征，演唱形式独特，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当读者对“长调”的概念有了确切把握，再读诗句“酿了很短很短的歌词/心儿那么一开/便变得很长很长/如绿草的地毯铺到天边/像花儿遍地开放……/所有的日子都被它拉着跨

过了门槛/抑或喜悦抑或忧伤……”就如聆听一位长调歌手的演唱一样，领悟到蒙古族歌曲旋律的优美、感情的深沉、草原气息的浓郁。再如《敖包》一诗，作者在注解中说：“敖包：蒙古语，意为堆子，就是人工堆成的‘石头堆’‘土堆’或‘木块堆’。旧时遍布内蒙古各地，今数量已大减。原来是在辽阔的草原上人们用石头堆成的道路和地界的标志，后来逐步演变成祭山神、路神之地和祈祷丰收、家人幸福平安的象征。”知道了“敖包”是什么，对诗人所写的与敖包的对话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了寻你/路上的足迹/已开满诗的旖旎/我把那鲜活的细节/都垒成了敖包/温暖的记忆/靠紧的石头啊/都是晶莹的泪滴/你是否也在寻找/我闻到花的清香/已转为歌/我看到云的哈达/已变成雨。”透过这样的诗行，草原上的石头堆便融入了记忆，融入了温暖，融入了泪滴，完全诗化了。武自然对于蒙古族文化深切的热爱，使他能迸发出强烈的激情，并将其辐射到对象中去，使文化的化石放射出诗意的光芒。

从小在内蒙古长大的武自然，受蒙古族长调、短调以及牧歌、赞歌、酒歌、思乡曲、婚礼歌等影响极深，以致这部诗集带有明显的谣曲特色。谣曲也就是歌谣，歌谣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只可以读也可以唱。比如这